

A C E N T U R Y ' S J O U R N E Y

BY
ROBERT A. PASTOR

世纪之旅

七大国百年 外交风云

[美]罗伯特·A·帕斯特
编

胡利平 杨韵琴
译

东

方

编

所

译

丛

译



BY
ROBERT A. PASTOR

世纪之旅

七大国百年 外交风云

[美] 罗伯特·A·帕斯特
编

胡利平 杨韵琴
译

东

方

编

所

译

丛



033376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旅:世界七大百年外交风云/(美)帕斯特
(Pastor, R. A.)编;胡利平,杨韵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A Century's Journey: How the Great
Powers Shape the World

ISBN 7-208-03597-0

I. 世... II. ①帕...②胡...③杨... III. 外交史-
世界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7061号

A Century's Journey: How The Great Powers Shape the World

Copyright © 1999 by Robert A. Pasto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0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Subsidiary of Perseus Books LL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范蔚文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东方编译所译丛·

世纪之旅

——世界七大百年外交风云

[美]罗伯特·A. 帕斯特 编

胡利平 杨韵琴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5 字数 289,000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6,000

ISBN 7-208-03597-0/D·625

定价 22.00 元

导读：析百年政治沉积， 展七国外交经纶

走进美国任何一家较大规模的书店，都可以找到几十本有关当代国际政治的新著。译者偏偏挑中了这本《世纪之旅——世界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用以介绍给国内读者，说明译者颇费匠心，又独具慧眼。因为本书不是晦涩艰深的学理性著作，却有很坚实的理论基础，充满学者的睿智和哲理；不是外交史的叙述，却透射出深邃的历史眼光；不是政治家或外交官的回忆，却写出了惟有经历过政治风雨的作者才具备的那种切身感受；不是本土学者对自己国家对外关系的总结，却力图折射每个国家对自身国际地位和利益的认识。

不言而喻的是，本书处处都反映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历史观和美国利益，而不可能站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但政治立场的不同，不妨碍我们从本书中悟出一些新的道理，也不妨碍我们了解美国学者研究其他国家外交的深度和水平。

本书的目标和主题，是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勾画英、法、德、俄（苏）、美、日、中七大国在整个 20 世纪的外交轨迹，对它们各自的外交传统和特色作出比较，并通过历史预测未来。主编罗伯特·帕斯特是美国佐治亚州埃默里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曾在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和国防

部的顾问。他撰写了第一章(导论)和最后一章(归纳总结)。其实,读者不妨先读完这两章,再去细细品味分国别论述而相得益彰的其他七章。正如帕斯特所希望的那样,由于他的引导和总结,全书的质量超过了各篇文章质量的总和。

帕斯特在导论和总结里都强调,过去一个世纪里,大国的外交目标发生了虽非彻底但具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初,七大国要的是帝国*,而今天它们要的是市场。世纪初,七大国中的大多数国家是君王统治、拥有境外领地的帝国,而今天它们的领导人都是选举出来的,都声称信奉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原则。它们的首要目标都是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今天的大国游戏不再是争夺殖民地,抢夺黄金、矿产和自然资源,而是竞争市场和流通着的资本、技术和就业机会。

因此,大国在彼此竞争的同时,力求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不愿成为无可挽回的冤家对头。一味追求威胁或打垮对手,到头来自己也会大受损失。国家用武力夺取领土和资源,在一百年前是常态,而在今天已十分罕见。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武装冲突发生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主要由跨国公司组成的、包括各类专业团体的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不但对各国政府的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通过跨国网络联合在一起,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 “帝国”(empire)一般指的是版图很大、多民族、拥有海外殖民地(或主体民族居住地以外的大片领地)的君主国家。国际上由“帝国”引申出来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概念,同国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大不相同。“帝国主义”可以指维护和扩大帝国的理论、政策、主张,早于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存在。要认真看懂本书的内容,还应当注意第5页注释中关于国家(state, country)和民族(nation)定义的区别。第五章的作者反复强调的论点,是俄罗斯或前苏联一直追求帝国的目标,而俄罗斯或前苏联从来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在帕斯特称之为“自由时代”的国际关系新时期,他举出六种有代表性的观察国际政治的角度或理论,并分别作出评论。帕斯特指出,这六种理论观点都强调了当代世界政治的某些特征,而忽略了另一些特征。第一种是“全球化论”,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政府越来越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和对外贸易,并为此而付出政治代价,国家主权于是受到制约和削弱。帕斯特举出数字说明,40年来发达国家的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成倍增加,达到一半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支也呈上升趋势,说明政府的规模没有缩小,主权没有削弱。相反,全球化趋势激起了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应。

第二种是“文明冲突论”。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世界各大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今后全球冲突的主线。帕斯特反驳道,20世纪最惨烈的冲突不是爆发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爆发在同一文明内部。冷战结束后,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发生在同属非洲文明的卢旺达和布隆迪。

第三种是“世界新秩序论”。这种观点试图说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正在建立一种新秩序,在军控、贸易、金融等领域制订新规则,迫使主权国家遵守。帕斯特指出,只有主权国家自愿采取共同行动时,联合国才有权威,国际规范才能得到遵守。所以“世界新秩序”远未形成。

第四种是“民主和平论”。这种观点讲的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分野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而成熟的民主国家越多,世界和平越有保障。作者对这一理论没有直接批评。

第五种是把世界设想为北美、欧洲、东亚三个国家集团的“泛区域论”。帕斯特说,很难设想东亚地区能够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且每一个地区的主要大国都离不开开放的全球贸易

体系。

最后一种是“主权国家论”。作者没有指出这一视角有何特色,无非是针对以上几种观察视角对国家作用下降的预测提出反驳,重申今日世界的主要角色仍然是主权国家。帕斯特认为,以上六种视角并非相互排斥的,如果把它们交叉起来,可以对一个多维的世界作出更为深刻的解释。

不过,从结尾一章看,帕斯特对“民主和平论”似乎情有独钟。他说,相互依存的经济纽带固然会增加国家之间冲突的代价,但不能保证冲突的发生;只有民主化才能抑制大国之间的战争。七大国里的俄罗斯和中国前途不明,既可能走向民族主义的专制,也可能向现代民主过渡。从各大国在科索沃冲突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国内政体的性质起了决定性作用。北约国家尽管在是否派遣地面部队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却都支持对南斯拉夫内部民族冲突的干预;但俄罗斯和中国因为担心西方国家干涉自己的内政而强烈反对北约的行动。

帕斯特声称,要维护“自由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关键取决于中国和俄罗斯“向市场民主的过渡是否成功”。这是作者眼中对美国最严重的挑战。“如果这两个国家觉得遭到排挤或被逼入绝境,成功过渡的希望会随之减少”。如果过渡成功,则中俄两国同西方合作处理全球安全问题的前景会更加光明。

平心而论,帕斯特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战略设想并无特殊的高明之处或惊人之语,他只不过是在尽量地博采众家之长。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的均势学说仅仅关注大国之间的权力关系,从“单极”还是“多极”的狭窄角度观察如此丰富多彩的多层次的当代世界;热衷于宣扬主权观念已经过时的自由主义学派,则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视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本书作者从美国

的长远利益出发,尽量地避免从单一的角度界定政治世界,既考虑大国关系的稳定,又考虑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动力所带来的变化。

帕斯特所主张的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防范和交往“双管齐下”的政策,是美国目前的政策主流,也是中俄两国必须全力以赴对付的一种政策,其核心是运用西方的“软力量”(贸易和投资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渗透力、政治的影响力等等),促进两国加速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和平演变”。只要中俄在经贸等方面的相互需求达不到它们各自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需求,两国就很难在政治和外交上紧密合作,抗拒西方。

同时,期待西方联盟内部裂痕逐渐加大以至最终解体,也是不现实的。正如帕斯特所指出的,同美国实力最接近的两个大国——日本和德国——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宁肯“搭便车”而不愿直接挑战美国霸权。英国依靠在欧盟里同美国的特殊关系而维系其大国地位。法国在西方国家里对美国的独立性最强,但法国的外交能力要通过欧盟的集体行动才能更好发挥,而它在欧盟里又受到德、英等国的牵制,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分别论述七大大国外交政策的各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也是帕斯特立论的基础。应当说,这些对七大大国外交特色的描述和分析,大多比帕斯特的开篇和结尾更为精彩。

首先,罗伯特·利伯在第二章里勾画了英国一百年来从帝国皇冠顶上跌落下来,又在最近 20 年里取得初步复兴的过程。利伯指出,两次世界大战和大战之间的经济衰退,使英国元气大伤。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英国仍然处于痛苦的调整过程之中,经济政策摇摆不定,劳资关系紧张,在外交上既未摆脱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又在融入欧洲的问题上犹疑不决。英国

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渐渐落后于日本和其他欧洲大国。面对蓬勃发展的欧洲统一趋势和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经济,英国反应迟钝。

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 1979 年上台后,大刀阔斧地推行私有化政策,大幅度减税并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对外坚定地自信地采取民族主义立场,在重大问题上同美国站在一起。梅杰政府基本上继承了撒切尔的政策,只是较为温和。1997 年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执政思想,强调机会均等的自由派理想,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同时,英国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大大加强,而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下降,突出显示了英国已经告别大英帝国的历史,成为一个欧洲和大西洋国家。

利伯相当看好英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前景。他认为,英国比法国、德国和日本更能调整自我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法国和德国的社会福利负担过于沉重,而日本的经济结构和政策僵化。英国在国际竞争中有不少有利因素,如语言与文化的优势地位,经济的活力,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在欧盟中的突出作用(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核威慑与向海外派遣小规模快速反应部队的的能力,外交技巧的娴熟,等等。

斯坦利·霍夫曼不愧是国际政治领域里享有盛名的一流学者,把关于法国的第三章写得有声有色。霍夫曼开宗明义地道出一百年来萦绕在法国人心头的两大忧患:一是德国,二是担心自己走向衰落。在处理同近邻大国德国的关系时,法国的战略几经转折:在一次大战前后采取敌视和压制德国的政策,在 30 年代同张伯伦领导下的英国一起奉行对德绥靖政策,在二次大战中屈辱地投降了法西斯德国,在冷战时期同联邦德国结为盟友,冷战结束、德国统一后,法国又企图借助欧洲一体化消解德国问题。

霍夫曼对法国领导人戴高乐所代表的那种不屈不挠、不甘落后的爱国主义褒扬有加,对法国治理社会的健全政治体制也表示赞赏。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揭露了法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遭受的外交挫折及其原因。他说,法国对自身衰落的担心是同德国问题缠绕在一起的,当前法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最能说明法国面临的两难处境:法国希望欧洲一体化既能约束德国的行为,又能避免法国走向衰落;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使法国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又能抵御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然而正是欧洲一体化可能导致法国丧失其护身盔甲——法兰西国家,丧失戴高乐为之奋斗终生的法国的独立自主。法国企图依仗欧盟抵制美国的压力,但欧盟本身并不团结。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不会像许多法国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膨胀了的法国,而法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欧洲化,以消除它百年来挥之不去的两大隐患。

在第四章里,约瑟夫·乔菲笔下的百年德国真是命运多舛: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外交政策比德国摇摆得更为剧烈,也没有哪个欧洲大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土版图如此变化多端。倒霉的地理位置使德国在战略上永远面临一场噩梦,即俄罗斯、法国、英国或其他周边国家结成打击德国的同盟。地处中欧腹地的德国易攻难守。它有足够的力量击退欧洲列强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但无力与所有列强为敌。德国曾经试图同其他欧洲国家结盟,甚至发动过称霸欧洲的战争,以图消除反德同盟的噩梦,都未能成功。乔菲说,希特勒同时发动了两场争夺霸权的战争,一场是争夺战略霸权的战争,另一场是灭绝“劣等民族”的争夺种族霸权的战争。在给欧洲带来空前的浩劫之后,德国只能接受遥遥无期的屈从和惩罚。

在一次大战中战败的德国企图通过重新武装东山再起。二

次大战后的联邦德国接受了这一惨痛教训,同时其他大国对德国的军事占领也使它无法再做此设想。乔菲认为,从战后初期的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开始,德国采取的复兴战略便十分高明——自愿实现同西方的一体化。它每朝着欧洲经济一体化迈进一步,在欧洲同盟中的发言权和自决权就大了一分。联邦德国是美苏冷战的受益者。在西方的扶植下,联邦德国成为德国政治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勃兰特总理同他的继承人施密特执行的“新东方政策”使联邦德国得以扮演东西方关系仲裁者的角色。

在 20 世纪接近结束时,历史老人对德国似乎格外青睐。德国又是冷战结束的受益者,意外地获得重新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凭借其人口、经济实力和战略要冲地位,正再次称雄欧洲。乔菲指出,德国总理科尔对过去百年的教训刻骨铭心。科尔懂得,德国的自我克制是自主的必要代价,参加欧洲一体化是发挥领导作用的条件。德国用建立欧元来约束自己,而由于德国马克的强劲地位,欧洲货币联盟的最大获益者其实是德国。乔菲对德国的民主化大加赞赏,声称在 20 世纪末第一次出现了国际游戏的规则有利于德国的局面,结果“本世纪最穷兵黩武的国家成了一头生性怠惰的树懒”。如今的德国放眼眺望,看不到任何战略威胁,这在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20 世纪出现过三个俄罗斯:沙俄帝国、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在论述俄罗斯的第五章里,罗伯特·莱格沃尔德试图找出贯穿三个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的一条主线。他认为,地缘政治上的目标,如寻找不冻港、控制黑海海峡、称雄于欧亚大陆中心等等,不能构成一条主线。历史上俄罗斯怀有的使命感(泛斯拉夫主义)也不是主线。莱格沃尔德说,“俄罗斯特殊论”似乎才是贯穿三个俄罗斯的那条主线。俄国人始终认为,俄罗斯有

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代表着比西方更高一层的文明，因而需要而且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沙俄时代，斯拉夫文化的推崇者和主张西化的俄罗斯人一直相互对峙，其争论焦点是同西方文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俄罗斯特殊论”在外交上的表现，是三个俄罗斯都以各种方式探索如何自立于现存的国际关系体系之外，或建立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些探索几乎总是殊途同归——俄罗斯对外国的仇恨和排斥。

莱格沃尔德猛烈攻击苏联的外交行为。他说，沙皇俄国虽然到处扩张，其内心实际上是主张维护当时的国际体系和行为规范。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打破了两派的僵持局面，完全抛弃了西方价值观。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宣扬本国至高无上的国际地位和苏联政治制度的无比优越，是“俄罗斯特殊论”的另一种表现。苏联立志要推翻现存国际体系，斯大林坚信，根据历史规律，资本主义连同维护其生存的国际制度将被彻底埋葬，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同西方的合作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同西方在限制核军备等问题上的妥协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只有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短时期内，苏联才放弃了长期敌视国际体系的观念。但戈尔巴乔夫尚未来得及贯彻他的外交思想，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至于俄罗斯的发展前景，莱格沃尔德未敢乐观。他说，在充满未知数的世界里，俄罗斯是最大的未知数。从积极方面说，出现一个温和的、与国际接轨的俄罗斯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俄罗斯渴望成为现存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其对外经济关系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部分。但是，更可能出现的是一个“敌视外界、好斗”的俄罗斯，它满腹牢骚，继续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最坏的一种可能性，是一个一意孤行的俄罗斯最后分崩离析，造成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虽然莱格沃尔德没有为西方国家的对

俄政策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但他显然希望西方鼓励俄罗斯“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心”。

帕斯特不仅担任本书的主编,而且撰写了论述美国外交的第六章。不过同其他作者相比,帕斯特不仅更缺乏客观立场,对美国外交矫饰、掩盖之处甚多,而且缺乏理论深度和独特视角。他花费了大量篇幅对美国外交史进行描述,但可圈可点的地方寥寥无几。

第六章里最值得细读的段落,是帕斯特讲述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是如何规划国际秩序的。他讲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到一个月,罗斯福总统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战后的世界规划蓝图。美国吸取了一次大战后参议院未批准威尔逊政府加入国际联盟的教训,在1943年就决定组建联合国,之后又同英国商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美国早在战争结束前就决定不向战败国索取战争赔款,战后初期的杜鲁门政府又通过马歇尔计划协助西欧振兴经济。半个多世纪之后再来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令人感叹美国为建立和维持霸权之煞费苦心和老谋深算。美国管理经济和社会都以制度建设见长,在国际上也一贯以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来巩固对它有利的国际秩序,而绝不仅限于强调“领导地位”、“单极世界”或干涉他国内政。

肯尼思·派尔撰写的第七章,突出描绘了日本为追求强国地位而奉行的实用主义外交路线。日本为了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不惜牺牲本国的传统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日本外交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固定的政治原则。日本人衡量领袖的标准就是看他们能否摸准形势,见风使舵。日本在外交上同样采取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整个20世纪,国际舞台上谁独占鳌头(世纪初的英国,二次大战前的德国,战后的美国),日本

就跟谁结盟。

派尔发现,二次大战后的日本虽然远离国际政治中心,但它要同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念头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通过对在经济领域大展宏图而得以实现的。它对国际秩序的适应能力,对意识形态的淡薄,对超级强国美国的依附,外交上的消极被动,对技术的精益求精,都成为它崛起为经济强国的资本。派尔认为,日本今后仍然会执行这样一条精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只要国际格局不发生大的变化,日本就不会作出重大的外交调整,也不会作出重大的国内政策调整。现阶段日本最头痛的外交问题是中国的崛起。在近现代史上,日本从未面对过一个强大的中国。由于日本无力单独同中国抗衡,它必须借助美国的力量。另一方面,日本也必须同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保持一定距离,以免过分得罪地理上的近邻——中国。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在第八章里总结了百年来的中国外交。虽然篇幅不太长,提出的观点也未必能为我们所接受,但中国读者肯定能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奥克森伯格对中国的前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既没有宣扬“中国威胁论”,也没有预言中国政府会垮台。同中国人写的近现代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奥克森伯格强调 20 世纪的中国历届政府和历任国家领导人所宣布的外交目标“基本上如出一辙”。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有一些基本政治信念是相通的,例如中国历史的伟大和复兴中华的使命感,国家统一和多民族团结,主权的不可分割,对西方阴谋分裂中国的警惕,通过加强军事实力恢复大国地位等等。当然,不能指望像奥克森伯格这样的西方学者能同我们一样,深刻地理解新中国同旧中国的本质区别。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我们中国人也在总结过去,展望明

天,总希望历史记忆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然而本书主编帕斯特却说,在展望未来之前,人们应该记得,近代史是一部不可预测的历史。不论本书作者的政治立场同我们多么不一致,他的这句话却很值得深思。远的不说,至少从笔者 70 年代末开始学习国际政治以来,研究者没有预测到未来发展的例子俯拾皆是。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中期,人们在预测未来时,讨论的是在世纪末苏联的国力是否将超过美国,以及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走向。当年有谁预料到苏联很快就将解体? 80 年代末、90 年代上半期,研究者热衷于讨论的是日本何时将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超过美国,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多极格局何时形成,“21 世纪是亚洲世纪”等等。有谁提出美国经济将独占鳌头,日本经济会长期萎靡不振,亚洲将爆发金融危机? 此后的印巴核试验、科索沃战争、朝鲜同韩国和西方迅速改善关系、南斯拉夫政权易帜,也都在众多研究者的预料之外。如果人们对未来事件的预测竟然如此无力而无助,当判断什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时,是否应当更加谨慎一些呢?

深究研究者预测失灵的原因,恐怕不在于历史知识太多,考虑的可变因素太多,而在于历史知识不够,一厢情愿地筛选变量,或者对历史的解读有偏差。因此,研究历史经验,对于预测未来还是绝对必要的。本书为七大国百年来的外交经纶提供了一些可供思考和批判的观点,相信读者自能从正反两面读出一些历史借鉴、治国之道。

王缉思

记于新千年第一天

前 言

冷战的结束既没有给地球带来和平,也没有给人类带来善意。不过原先紧张的战略关系因此得到缓和,各国得以集中精力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冷战的结束还造成了世人的无限迷惘。对那些喜欢从美苏胜负角度看待国际上发生的一切的人来说,当今的世界矛盾重重,错综复杂。今天,反美的原教旨主义者可以一面焚烧美国国旗,一面大嚼美国汉堡包,且不会消化不良。

全球化似乎正在压缩世界,使它日益趋同。与此同时,世界又好像走向四分五裂。宏大的理论解释了技术与民主的整合力和宗教与民族的分裂力量。这些理论看上去似乎互相矛盾,但都包含一个共同的观点:世界大国,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历史古董。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

基于以下原因,我们几个人合写了这本书。首先我们认为,主权国家,尤其是英、法、德、俄、美、日、中,在整个 20 世纪里始终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根据我们的预测,下一个世纪主权国家很可能还会是主角。其次,我们认为认识下一个世纪的最佳切入点是了解世界各国是如何勾勒出 20 世纪国际体系轮廓的。这并不是什么新想法,但近来它却受到排斥。有人认为,今非昔比。研究历史已意义不大。

研究世界缩小或分裂原因的种种新理论精辟地揭示了国际上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新的形势促使主权国家重新认识自身的利益。但我们认为,不应把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与主权国家政府的力量混为一谈。主权国家制定规则,而且在 20 世纪,它们改变了游戏规则。称霸世界的不再是帝国,而是市场。

当然,有些读者对由 7 位外交政策厨师烹制的一锅汤可能没有胃口。不过像这样一锅把众多国家烩在一起的鲜汤,绝难出自一位学者之手。我很高兴能与这些知名学者合作。每篇文章的作者也是研究该国的权威。我们要做的是对七大国的百年史去粗取精,抽出有助于人们了解它们的过去和未来走向的精华部分。在分析贯穿整个 20 世纪的外交政策时,本书作者还采用了便于使读者透析七大国心理活动的写作手法,如英国的扎实外交,法国的忧患意识,德国的实用政治,三个俄国之间的藕断丝连,美国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日本对邻国的野心和中国的历史包袱。

我们每个人筛选出最能说明每一个国家特点的素材,并互相参阅各自的选材。本书大纲经过讨论后,我们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各章的初稿。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得到了与会者的反馈。书中的不同主题也衔接得更紧凑。我们数易其稿,一直改到我们觉得全书的质量超过了各篇文章质量的总和。

我在过去 25 年的生涯中经历了本书叙述的部分变化。我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 4 年,为促进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献计献策。以后又在一个非政府组织——卡特中心工作了十多年,从事写作、教书并管理国际问题项目方案。

在为期 10 年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亲身参与了调停一个国家内的冲突——尼加拉瓜。我的这段经历表明了当时国际体系发